



老舍文学院·文学会客厅

三生万物：三个女人的故事

八种视角透视郑在欢长篇小说《3》

“老舍文学院·文学会客厅”优秀作品分享研讨会，以专家研讨、学员分享的形式，给青年作家持续提供帮助，让作家与作品走进更多读者的视野。文学会客厅第2期由徐晨亮、李壮、刘诗宇、相宜等专家学者研讨青年作家郑在欢的长篇小说《3》。

——编者



郑在欢，作家，著有《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等作品。北京老舍文学院年度奖学金获得者。《3》首发于《十月》杂志。



徐晨亮：小说写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当下三十年间城乡社会结构、精神秩序剧烈变动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少男少女。这个群体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基底”。

人”既关乎数量也关乎本质，羁旅漂泊、浪迹萍踪，你遇到的人也塑造着你的人格和命运。郑在欢的《3》很生动地写出了三个女人的成长，到小说最后，她们因为有了彼此，都不再是孤单一个人，同时她们也共同成长，终究都变成能与命运和解的成熟而独立的人。

这个微小部分，《3》背后寄藏着朴素、良善的对于女性和美的理解：它是自娱自乐的美，也是丰俭由人的美，可以以日常化、平民化的方式体现。更重要的是，它是女性自己主宰生计、女性为女性提供的服务。

李壮：这部小说写从底层上来的女性，按照我们以往阅读预期，可能会让人觉得，故事大概有点惨、有点悲情。其实并不是。几个女孩子的内心很强大，而且有旺盛的生命力。

相宜：小说书写了母亲、奶奶、姑姑、继母、邻居奶奶等乡村母辈，篇幅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开篇三个家族发生的事件都与母亲的生育与身体有关，这是小说对乡村少女成长生活的前情概述与下集预告。

梁豪：所谓“女子的境况”，呼之欲出的背面就是一个“男子的图鉴”。正是因为有了男子的强悍和自负，有了男子的权威与霸道，以及他们的担当和随之而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常常又会扭曲成各种形态的暴力，施加给周遭的女性。

刘诗宇：郑在欢的《3》写三个女人的故事。在题记里作者引用“三生万物”，三个主人公大雪、春蓝、秋荣分别以冬、春、秋命名，唯独没有夏，因为夏天明媚灿烂、百花盛开，不符合三个女人充满波折与坎坷的人生。

刘欣玥：徐晨亮老师刚刚也提到跨性别书写的复杂性，男性作家去写女性的成长、身体经验，这其中的分寸感很有挑战性，容易引起不适和质疑。大家刚刚没有提到小说里的美甲，三姐妹最后合开的是美甲店，郑在欢很巧妙地借助美甲这个中介，对劳动女性的身体政治进行新的阐述。

谷禾：《3》在《十月》发表的时候，我作为责任编辑，没有要求郑在欢对故事结尾做修改，甚至整部小说也没有要求他修改。我觉得小说的结尾亮色一些，能够多给读者一些安慰和温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修水虽穷又边，但耸立着两座文化高峰：黄庭坚家族与陈寅恪家族。冬茅象征着主人公——“拗烈”的首席记者茅子，“冬茅是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因为探求真相，深陷困境四面楚歌，“每年冬天，在河滩上种菜的菜农会放火点燃茅草，因草木灰是极好的肥料。”

从“象征”到“镜像自我”——浅谈长篇小说《冬茅的行板》的文本意义

□陈政 邓玉琼

“乡愁意识”可说是《冬茅的行板》的书写底色。家乡情结是人的情感世界中最丰富、最珍贵的部分。写自己的家乡，在文本里面渗入乡愁，是无数优秀作品的重要手段。

除了相似的经历，好的小说家一般对人品有所要求，那就是：极敏感，特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三项条件一般会引导作家向两个方面前行：一是倾心于表达内心秘密的个人叙事；二是忠实于作家个人的自我表述，同时又以“从生存相到生活化，从生活化到个人化”的个体体验，充当小说这一样式的文学晴雨表。

也经历了“一些烂事”，这成全了这本书的全景效果。“读者读后，不会觉得小说情节胡编乱造。其实，这些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妙笔生花，而是源自生活的馈赠与积累。”

修水是作者匡建二的故乡。“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父亲没有半毛钱关系，却与修水浓郁的文化氛围脱不了干系。修水虽穷又边，但耸立着两座文化高峰：黄庭坚家族与陈寅恪家族。”

匡建二借闻一光这个虚构又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人物，寄托了他几十年的生命体验、生命理想和生命信念：路见不平、仗义执言，清高自持、不知转弯，不拘小节也有人性软弱。匡建二的书写始终带有个人的体温。他有时在表达内心的秘密：“他尽管已过了不惑之年，仍这般浮躁、冲动，缺乏定力。”

《冬茅的行板》的文本意义，还在于“象征”的重建。观察当下的小说文本，“象征”这种手法越来越少有人使用，这种现象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焦虑，有人甚至惊叹：“失去象征”了。我们回顾一下，不难发现，有多少优秀作品都使用了“象征”。在《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海明威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和形象化，通过深度挖掘文本中所隐含的意蕴，寄寓小说深刻的主题和象征意义。

冬茅象征着主人公——“拗烈”的首席记者茅子，“冬茅是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因为探求真相，深陷困境四面楚歌，“每年冬天，在河滩上种菜的菜农会放火点燃茅草，因草木灰是极好的肥料。”主人公在困境中执拗坚守，终于拨得云开见月明，“一开春，河滩上又是绿油油的一片”。匡建二把家乡的冬茅作为家乡的象征物，有着特别的“事半功倍”作用。

匡建二借闻一光这个虚构又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人物，寄托了他几十年的生命体验、生命理想和生命信念：路见不平、仗义执言，清高自持、不知转弯，不拘小节也有人性软弱。匡建二的书写始终带有个人的体温。他有时在表达内心的秘密：“他尽管已过了不惑之年，仍这般浮躁、冲动，缺乏定力。”有时，他又在自我表述：“他敏锐地感觉到，要到大一线去。首席记者的职责是什么？就是在有突发情况和重大事件时，能冲锋陷阵，挑起现场报道的大梁，起到排头兵的作用。”

作为修辞方式的一种，象征手法常常被运用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当中。只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许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里面有个转换环节，必须将“象征对象”看成修辞背后的主体性象征物。如“冬茅”就是作者本人；家乡的“冬茅”是家乡的“象征物”，从这个角度看，“冬茅”是匡建二的生命符号。“我出生在冬天，正是冬茅花烂漫的季节。冬茅的生命力极强，在凛冽的北风里，它铁红的茎秆，雪白的芒花显得格外

这本小说的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小说主人公闻一光身上有着匡建二鲜明的个性。读《冬茅的行板》，很难不把主人公闻一光和匡建二本人联系起来。主人公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没有正规学历，没有任何背景，却凭着才华和勤奋走上新闻采访和报道之路，并成长为省报首席记者。匡建二早年曾在江西日报做过首席记者，用脚丈量天下，江西全省100个县（市、区），到过98个。他自己也说，在30年记者生涯中，“不仅写出了数以千计的新闻稿件，还结识了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的朋友。不仅有农民、工人、小商贩、企业家、各级领导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人员。我和他们在一起畅谈人生故事，如此丰厚的资源，如此厚积的素材，也为我创作小说提供了天然的

马金莲的新作《爱情蓬勃如春》看似讲述爱情故事，实则是在这个古老的文学主题为引子叙述人生，从人生遭遇中反观生命。蓬勃如春的不只是爱情，还有生命，正如小说封底的那句话所说：“……在生存条件相对落后的西海固地区，为了奔向好日子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

《爱情蓬勃如春》是由情感模式、时代发展、社会问题、人性情感以及地理空间等多重主题并行叙事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8则小故事，以西北小城市民为对象，反映了山区小城与时俱进的发展状况、朴素而琐碎的生活现场，以及人物的生命态度。马金莲的笔锋带有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西北方言、口语、俚语、网络用语等的运用令整部小说读起来有强烈的“在地感”，同时还很接地气。

这些故事关于边缘山区小城的生活种种，带有浓厚的生命气息，通过形形色色的生命主题诠释生命的态度。书中涉及小城“大龄剩女”与父母辈的情感模式信念（《爱情蓬勃如春》），从乡村走向小城的女性对人生的接受态度（《落花胡同》），地方民族的生活模式和民俗文化以及表姐姊妹的情谊（《时间花环》），通过人为的车祸突出小城的弃养老人问题（《相撞》），女干部下乡扶贫的生活和奇遇（《牛蹄窝纪事》），深藏不露的小乡镇干部（《老鸹别传》），富有同情心的女公务员遭遇横祸（《年关》），月嫂插足的婚姻（《亲爱的》）等。8则故事看似不连贯实则具有共通性，从侧面反映出因时代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存在于大小城市，如小说里提到的：“时髦的东西长着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的，山区小城也会出现，区别只在于时间的迟早”。“时髦”一词有多样化的解读，可以看成常见于大城市的情感模式和社会问题跨越了地理空间，再现于小城市。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带来的交通便利和服务应用。

马金莲笔下的人物皆来自西北小城市的普通市民，他们是干部、公务员、上班族、教师、农民工、月嫂、扶贫对象和残疾人等，有不同身份，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在有限的篇幅里或温和、或苦闷、或无奈、或暴力，演绎出社会万象，展现出平凡、复杂、真实、圆滑的普通人形象。通过这些人物，马金莲思考了个体如何从寻常生活中纵览时代洪流，以社会百态穿透生命轨迹，将濒临枯萎的生命转换轨道、向阳而生。

书中无论男女老少，皆有风采。女性角色如有恋爱情结的“大龄剩女”木清涛，乡村进城务工挣钱的马小花、冒充北京贵妇的咸兰兰、掌握古老习俗的奶奶和外孙女祖代、以忙碌填补二婚不幸的干部白燕、积极生活的扶贫对象戚翠花、恋爱失败后转身投入新感情的拜秀芸、生活平庸却因善良之心而遭到横祸的公务员李梦梅、看似老实憨厚却满是心机的月嫂王金霞，以及在面对月嫂插足婚姻时断然选择离婚的李兰。尽管她们的年龄、社会阶层、婚姻状况和人生遭遇各不相同，但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生命态度。小说以多个女性角色、多股女性声音以及多种女性视角轮番揭开小城的社会问题和展示小城的生活模式，并在各自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协调和处理问题。

男性角色则有将爱情延续蓬勃绽放的丧妻木先生、木讷朴实的黑黑、倒霉的穷光蛋王越、受家人利用后弃养的退休老人、精神障碍患者六子、不善交际却个性圆熟的李济民、高高在上的机关在职人员、怒气冲冲的讨债农民工，还有个个性拧巴的王大鹏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男性角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侧面反映了性别差异下不同的生命态度。

《爱情蓬勃如春》还构建了一个生命关怀的立场，体现“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哪怕他们的生活不尽美好，但是他们依然在对生活和生命缝缝补补，这是作者对小人物寄予的生命祝福。可以说，马金莲以点到为止的笔墨将山区小城的生活琐碎、情感模式、社会问题等共同指向一种如何在生命征途中自我认识、修行和调整的生命观。作家有责任将生活观察转为文字，提出社会问题，提高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或群体的关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诠释正面的生命态度。我们唯有相信自己，尊重生命平等，认真思考生命观，方能建立积极的生命态度，赋予生命以活力与价值。

精神。”作者用“铁红”和“雪白”这样一对鲜明的色彩来描述冬茅，实则刻画的是寄托了他的生命理想的冬茅。而一腔孤勇的“铁红的茎秆”、清高孤傲的“雪白的芒花”，又何尝不是象征对象的生命底色。无论主体是谁，认同问题的实质都在于主体自身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关系的确定。从这个意义来看，“冬茅的行板”也可以看作是“冬茅往事”。

最后说说文本意义中的“镜像自我”。当代文艺理论认为，小说的最高境界已经不是单纯的“塑造人物形象”，而是要找到自律自洽的“镜像自我”，这个概念由法国心理大师雅克·拉康提出。他认为，我们时常通过观察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形成对自己的评价。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犹如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能够反映出经过它面前的人的服饰、容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人的态度、性格。人与人可以互相作为镜子，照出彼此的形象。

镜子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既能让人观察到自己的理想状态，也可以照出自身的空洞和虚假。自我认知不是一个纯自我的过程，而是需要借助对别人的观察来达成目标，他人就如同我们照镜子时的镜像，所有的镜像都是柏拉图所说的“殊相”，只有将一个个镜像拼接起来，组成“共相”，我们才能从人的普遍性中了解自己。而在人物镜像的呈现上，作者并未单向度地以道德为尺度，衡量角色的一言一行，而是尽可能地拆解、勘探其内在心理，揭示特定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种非观念化的写作，为书写注入了现实和真实的质感，使得个体还原到人的本真状态，使小说的人物呈现出立体与多面的特点，突破了扁平人物的概念化表达，趋向于圆形人物。

可以说，《冬茅的行板》是一部矫正着揭示又不至于太游离的原创文学作品，它是活文，是有生命之文。乡愁意识带来的生命活力、活性元素的象征意义和镜像自我的鲜亮色彩也许就是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概括。

蓬勃如春的不只是爱情，还有生命

袁敏莱